

东南亚华人研究丛书

族群、历史与文化

· 跨域研究东南亚和东亚（下册）

庆祝王赓武教授八秩晋一华诞专集

—— 黄贤强 主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联合出版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东南亚华人研究丛书

族群

历史与文化

跨域研究东南亚和东亚（上册）

庆祝王康武教授八秩晋一华诞专集

黄贤强 主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联合出版
八方文化创作室

目录

前言	■ 黄贤强	v
代序	■ 王康武	vii

【上册】

一 跨族群与跨域研究

移民、族群与认同： 东南亚华人方言群的历史特征与发展动力	3
■ 吴小安	
新加坡早期的潮州人与福建人： 海外华人社会的传统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的比较研究	23
■ 颜清煌	
族群、历史、田野：一个客家集团的跨域研究	55
■ 黄贤强	
马来西亚新山潮人、客家人与海南社群移殖的比较研究	71
■ 安焕然	
近代南洋大埔人与原乡互动关系研究 以大埔县百侯村为中心	97
■ 肖文评	
家国春秋两地书：从槟榔屿到梅县松口 以梅县松口“荔香园”的一组批信为中心	123
■ 夏远鸣	
近三十年来东南亚华族与当地族群关系 一种民族政治学的分析	139
■ 李其荣	
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以台湾的族群平等法制化为例	157
■ 刘阿荣	

二 族群聚落与社会互动

- 日常生活中的客家意识：以沙巴丹南客家聚落为例 173
■ 林升忠
- 马来西亚浮罗山背的客家族群分析 195
■ 张翰璧、张维安
- 族群的接触与互动：以新加坡德光岛客、潮、巫三个族群为例 217
■ 利亮时
- 畚瑶、山贼、倭乱与粮户归宗 229
明清之际韩江流域的聚落形态与乡村社会变迁
■ 陈春声、肖文评
- 客家向闽南的推移及其与福佬民系的接触 259
附论土楼的起源与演变
■ 谢重光
- 从福建仕渡村的村落布局看闽赣文化的相互交流 271
■ 刘劲牛、杨奕
- 一个台湾客家地区的形成：日治以前中港流域的族群与经济 285
■ 潘美玲
- 试论台湾南部烟叶王国形成之“客家性”：一个区域比较观点 309
■ 洪馨兰

【下册】

三 族群记忆与认同

- 兰芳共和国的创建与经营：华人乌托邦的想象 323
■ 张维安、张容嘉
- 沙巴的华人——卡达山（华卡）混血： 347
东马混血社群的华人性研究
■ 黄子坚
- “客家摇篮”的“他者” 363
赣州闽南人的由来和分布之调查分析
■ 周建新

畲客族群关系的历史记忆 以闽西客家地区的神犬崇拜为重点 ■ 钟晋兰	379
从宗祠看广西客家的跨族群认同 ■ 王禄平、刘道超	393
族谱、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 以广西陆川县客家人为例 ■ 黄震	407
社神崇拜中蕴含的民族交往与融合之规律探析 以广西客家社神崇拜为例 ■ 刘道超	419
四 跨域文化与历史	
客风南被与南洋儒学：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客家诗人对星马华人社会的冲击 ■ 梁元生	435
粤剧网络——文化走廊： 以二十世纪初东南亚地区广府社群为例 ■ 伍荣仲	445
香港客家社团之研究 以香港崇正总会社会网络之析探 ■ 陈定铭、刘建宏	461
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客家社群的文化活动 以《客总会讯》为考察中心 ■ 王力坚	483
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华社与故乡及世界的联系 以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为例 ■ 蔡志祥	503
论马来西亚和香港学校教学语言政策： 兼述两地客家人的华文教育事业 ■ 刘义章	519
新加坡文化政策里的全球性与在地性 ■ 张碧君	535

是敌？是友？
太平洋战争前后东南亚的台湾人与华人
■ 李盈慧 551

侨汇争夺战(1937-1949)
国民政府官方行局与日伪、港府的侨汇争夺
■ 李小燕 571

五 跨域文学、语言与族群关系

华人与他人：
论东马留台作家李永平与张贵兴小说里的族群关系
■ 黄锦村 595

族群性的论述近二十年的马华文学研究
■ 游俊豪 609

龙瑛宗〈獏〉的解读：从“客家情结”到“亚洲现代性”
■ 蒋淑贞 627

大陆原乡、新加坡与台湾的大埔客家话之比较研究
■ 钟茶富 637

接触与变异：以广东丰顺汤南山客话为例
■ 林伦伦、李雪媚 653

广东丰顺双方言地区词汇特点比较
■ 魏宇文 675

后记 ■ 黄贤强 687

近代南洋大埔人与原乡 互动关系研究

以大埔县百侯村为中心

■ 肖文评*

历史学博士
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副教授

题引

粤东韩江流域的潮梅各县，是华南地区侨属的主要分布地区，向以“华侨之乡”著称。对于华侨的产生及其对侨居地和原乡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前辈时贤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对于推动华侨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纵观各项成果，也许限于资料和研究对象，或限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分类，往往有就华侨论华侨之嫌。对于侨乡的研究，不仅要关注侨居于国外的华侨部分，而且还要关注侨居于国内的部分，并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够真正理解侨乡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获得关于侨乡社会的总体认识。

据文献记载，位于韩江上游的大埔县从乾隆初年开始有人下南洋，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据统计，大埔现有人口50余万，而定居南洋者也有近50万，成为粤东地区的主要侨乡。百侯村位于大埔县东南部梅潭河流域的一个小盆地，是粤东地区著名的侨乡。近年来笔者多次到这一村落进行社会调查，收集了大量族谱、个人文集等民间文献，其中不少材料记载了在清末到民国期间，侨居于外的村民与原乡之间在处理乡村事务过程中频繁的互动关系。本文以百侯村为中心，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试对侨居南洋的大埔人与原乡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以加深对客家山区侨乡社会的认识和理解。

大埔是广东省东部隶属梅州的一个小县，古称“万川”，意思是在千山万水之中。全县现有人口50多万，大多是客家人。过去大埔人年少流离，闯荡海外。据

* 本文的调查和研究得到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招标课题(08JYKY01)经费的资助，谨表谢忱。

2000年统计，全县有侨居海外的华人华侨506209人，其中494015人分布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传统称为南洋的地区。¹

百侯村位于大埔县东南部一个由韩江支流梅潭河冲积而成的小盆地上，距老县城茶阳40公里，距潮州约180公里，距汕头约230公里。居民现有杨、肖、丘、池等30多姓，14,000多人，其中杨姓6,000多人，肖姓5,000多人，丘姓600多人。清初以来百侯文化发达，至清末共考中进士19人、举人104人，均超过全县总数的40%，有“一腹三翰院”、“同榜三进士”、“同榜七举人”的美誉。²清末民初又率先办起了小学、中学，文化教育质量高，成为粤东著名的“文化之乡”。同时也是典型的“华侨之乡”³，很早就有出外谋生的习俗。全村现居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人华侨达3万多人，超过家乡人口两倍以上。

一、近代南洋的大埔人

乾嘉以来，随着大埔人口的繁衍和工商业的发展，外出谋生者众，先是侨居于苏、杭等地。随着沿海的开埠和出洋的开禁，移民出现新动向，主要侨居于新加坡等南洋地区。

(一) 大埔人下南洋

大埔地区侨居南洋者，较早者为乾隆十年(1745)的张理和丘兆和。他们和福建永定县的马春福等，侨居于今天马来西亚的海珠屿。张理因教人伐木筑屋，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和当地人一起把海珠屿建设成为富庶的岛屿，被当地人尊称为“大伯公”。⁴影响较大者为百侯人肖贤舞。他于道光年间率同乡来到新加坡，开辟荒岛，并于咸丰八年(1858)创立新加坡茶阳会馆，为乡人出洋和侨居提供了便利。⁵

至民国年间，大埔人遍布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南洋各地，以至“侨外人数，几不亚于在乡。”⁶人数达数十万，成为开发南洋的重要力量。

以百侯村为例，从乾嘉以来，开始有村民前往南洋谋生。自道光以后，人数渐多。至清朝末年，百侯“环近四周之赴南洋诸岛，以及苏、沪、汉各处谋生者，

¹ 《梅州市华侨志》(广东：《梅州市华侨志》编委会、广东省梅州市华侨历史学会，2001)，页24。

² 参见拙文《从“贼巢”到“邹鲁乡”：明末清初粤东大埔县白墩乡村社会变迁》，《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³ 《梅州市华侨志》，页118。

⁴ 邝国祥《檳城散记》(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58)，页56。

⁵ 《新加坡茶阳会馆百四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茶阳会馆，1998)，页139。

⁶ 温廷敬《大埔县志》卷11，《民生志·殖外》(大埔：大埔县政府，1943)，页1。

计不下一二万人。”⁷ 到民国时期，村民已“络绎于南洋群岛矣”。⁸ 据1929年统计，百侯全村共1,4884人，而出外谋生者达4,014人。⁹ 其中到南洋谋生者，据估计在2,500人以上，几乎家家都有人在南洋。

(二) 下南洋的社会性因素

大埔人下南洋的社会性因素很多，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谋生的需要。与整个粤东客家山区一样，大埔村落人多地少，欲耕无田，这些因素促使大埔人为了谋生而下南洋。晚清至民国年间，这种现象在大埔县相当普遍。据民国《大埔县志》记载：“山多田少，树艺无方，土地所出，不给食用。走川生，越重洋，离乡井，背父母，以薪补救。未及成童，即为游子，比比皆是。”¹⁰

以百侯为例。百侯自清初以来虽然科举兴盛，文化发达，出外为官者众多，但是人口发展太快，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杨氏宗族在清初时才数百丁，但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时已发展到“男丁千余”，¹¹ 到康熙五十五年时竟达“丁二千有余”。¹² 肖姓人口也发展到2000多人。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百侯杨氏，“溯肇迁以来迄于今，兹鼎经四移，年逾五百，世则二十有一，丁则七千有余，此皆就地而言。”¹³ 仅杨氏，就达7000余人。整个百侯盆地，则在13000人以上。

百侯盆地及周边山区的开发在康熙末年即已基本达到极限，土地所出，不足三个月之需，生计成为当时百侯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为维持生计，因而形成“走川生”的习俗，即走街穿巷、到各地经营工商业为生。正如嘉庆九年《大埔县志》所称：“土田少，人竞经商。于吴、于越、于荆、于闽、于豫章，各称赞本多寡，以争锱铢利益。至长治甲民，名为贩川生者，则足迹几遍天下。”¹⁴ 其实不仅大埔北部的长治甲人如此，整个大埔县基本都是如此。从乾嘉以来，百侯人开始陆续前往南洋谋生，俗称“过番”。

⁷ 无名氏《论大埔邮政宜推至白侯》，《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⁸ 温廷敬《大埔县志》卷13，页7。

⁹ 温廷敬《大埔县志》卷3，页21。

¹⁰ 温廷敬《大埔县志》卷11，《民生志·殖外》，页1。

¹¹ 杨之徐《编年录》上册，（上海：泰东书局，1924），页132。

¹² 杨之徐《编年录》下册，页29。

¹³ 杨光辅《归善德化桥杨氏族谱》，《归善德化桥杨氏族谱》，道光二十三年三月。

¹⁴ 温廷敬《大埔县志》卷11，嘉庆九年（大埔：大埔县政府，1943），页4。

与其他深山内地相比，百侯水陆交通较为便利。在过去以水路运输为主的情况下，河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百侯位于韩江三大支流之一的梅潭河边，东溯梅潭河可至福建平和、漳州到厦门出海口，西下梅潭河可至三河、潮州至汕头出海口，南走陆路到高陂下韩江。历史上，韩江是一条黄金水上通道，几乎是粤东地区出海的唯一途径。百侯位于这条重要航线的主要支干上，为百侯人过番提供了有利条件。

而外部环境也为百侯人出洋提供了有利条件。十九世纪初，英、荷等殖民者加快了对南洋的开发，需要大量工人。随着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特别是1861年汕头的“开埠”，为因生活所迫而想出国的粤东人提供了可能。而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增大，不少百侯人在这种移民浪潮的影响下，背井离乡，远赴重洋。百侯人出南洋原是走陆路，经饶平到樟林港，坐“大眼船”出南洋，一路相当辛苦。如百侯杨姓人的女婿蓝秋山，于同治初年去新加坡，“适汕头未开埠，由樟林乘帆船出口，随风漂流四十余天，始抵噶叻。”¹⁵ 汕头开埠后，村民即改走高陂，从韩江水路到汕头，再乘轮船到南洋各地，时间缩短，安全性提高，因此出洋者更多。“自海禁既开，汕头一隅辟为互市，轮船往返，络绎如织。三十年来埔人之冒险进取，奔走于新加坡、槟榔屿、吉隆波及安南、暹罗等处，臂肩接踵，即远如亚美利加之新旧金山、德意志属之柯摩沙，莫不有茶阳之民族焉。”¹⁶

其次是风气驱使的结果。客家人极重宗族和乡土观念，一旦本族或本村有人出南洋并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立稳脚跟，便会介绍国内的亲友、同宗、同村人出洋，或跟随自己在工矿做工，或做自己店里的帮手，或代为介绍另谋职业。一个典型的例子，祖籍广东大埔县西河乡的印尼华侨富商张弼士在印尼领到了许多荒田以及所需的资金、工具、种子等，人手不够，于是他“一面请当地的华工帮忙，一面写信回家叫乡人多多前来。乡人以其在海外大有作为，皆争先前往投之。”¹⁷ 在此裙带关系的影响下，过番出洋逐渐成为一股风气，有时甚至一个村子或一个宗族的大部分男人都跟随出去，而且很可能与引介人都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地区。

例如1920年代侨居新加坡等地的杨慰然在《我所知道爱护族人的族先贤》中说：“我们的原籍是一个山多田少的偏僻山区，居民在民初时期海禁已开，分向南北洋找寻生活。……后继的人是全靠先到者的照顾与提携的。这些照顾后进的先

¹⁵ 蓝海文《大埔蓝氏族谱》第7册（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页644。

¹⁶ 蓝海文《大埔蓝氏族谱》第7册，页632。

¹⁷ 祝秀侠《华侨名人传》（台北：台北出版社，1955），转引自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页229。

贤，多得数不清的。”¹⁸ 在新加坡经营铝业的双坑人何呈爱，“笃情桑梓戚族，有初至及赋闲无业者，诣之均极厚待，并量力资助，设法安置，率以为常。”¹⁹

因此清末民初大埔男子一到十多岁就出洋，慢慢形成一种“男的一长大就要到外面挣钱谋生”的风气。

再次是发展的需要。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东南沿海的开埠和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南洋地区的开拓，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机遇。因此乡人在家乡接受基本教育后，纷纷出门闯天下。往南洋者，不是简单地赚取生活费，而是为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是他们的主动性选择。如侯南杨姓人的女婿蓝秋山有六兄弟，“见诸兄以农业难谋生活，决意别图发展。时清同治初，禁海甫开，仅有帆船航海，危险莫测，往洋者多是亡命之徒，而好人子大都畏避，惟公独具慧眼，以非出洋不能成大业，乃跪请于母者三日，始获诺。遂束装往星洲。”²⁰ 先是做佣工，稍有积蓄后开药店和当铺，数十年间发展成为巨富，为大埔人控制新加坡当铺业奠定了基础。杨兰芳，为乾隆乙丑科进士翰林院编修杨演时玄孙，副贡生选授龙川县儒学正堂杨德常曾孙，出身书香门第，世以业儒为生。但到清末，家道中落，且人丁渐繁，迫于家计，弃儒就商，到南洋谋生。“服贾海邦，远隔重洋。”其子杨捧章年仅十余岁，为继承父业，振兴家业，其母即将他送出家门去学商，并教导他说：

汝尚在童年，何忍远离，第男儿志在四方，营谋伟业，不宜株守家乡，作庸夫俗子之末艺。矧家徒四壁，非自奋勉，何以克振家声。汝学贾于外，当念业精于勤之义，勿事荒嬉。处世接物，时以“诚信”二字，自励可继承先志，慰倚闾之思。²¹

后杨捧章在沙劳越经商致富，成为当地有名的商人。致富后的杨捧章热心公益，捐资创办古晋大同中学，并出任旅越埔邑公所、大同学校总理。对家乡则“输财补助原乡族学，以及建公所、开报社种种慈善事业，莫不竭力襄助。”²²

再如杨锡禧，侯南楼下村青箱世业人，为通议第翰林杨纘绪的五世孙。世以读书为业，但其兄端禧、弟应禧应考不果，且命丧旅途，因而视学为畏途。遵照其叔杨春城之嘱，弃儒业商，帮助其叔打理位于潮安县城东堤的“来盛号”生意。

¹⁸ 杨默然〈我所知道爱护族人的族先贤〉，《新加坡杨氏公会特刊》（新加坡：新加坡杨氏公会1968），页28。

¹⁹ 《崧里何氏族史》（大埔县：崧里何氏族史修编工作委员会，1996），页927。

²⁰ 蓝海文《大埔蓝氏族谱》第7册，页644。

²¹ 杨自修〈中华民国十四年岁次乙丑六月吉日为兰芳又叔婆李太孺人七秩开一荣寿大庆〉，《编年录》第7册（手稿），页34-35，1928年。

²² 杨自修〈中华民国十四年岁次乙丑六月吉日为兰芳又叔婆李太孺人七秩开一荣寿大庆〉，《编年录》第7册（手稿），页36，1928年。

“越年，国事已非，认为在家固守无益，当时乡人出洋者众，提出愿远涉重洋，再开新径。初至新加坡，落足巴生，养猪酿酒，惨淡经营，披荆斩刺，备极辛苦。继与子其锜、其乐，更拓地种植橡胶，兼营他业。是以生意日隆，生活益裕……中年后，思乡心切，隔年必回一省视老母林太夫人。”²³ 民国初年，随乡人到新加坡，经营养殖业和种植业，并将妻儿一起接去，经过艰苦创业，终于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创下一份不菲的基业。

(三) 主要职业和社会影响

1920年代侨居新加坡等地的百侯杨自修之子杨懋然在《我所知道爱护族人的族先贤》中说：

我们的原籍是一个山多田少的偏僻山区，居民在民初时期海禁已开，分向南北洋找寻生活。走北洋的以上海为第一站，然后分向苏、杭、楚、川等处，作条丝、烟叶或戒烟丸的经营。走南洋的大都先到新加坡，然后分向南洋各岛屿，或为人雇，或经营小贩生意。²⁴

这一概括，基本说明了大埔人侨居于外者的地理分布和主要职业。侨居南洋者，以新加坡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等地，除了新加坡相对集中以外，其他地方居住相当分散。职业主要是做工，或者经营小商贩。很多人在非常偏远的地方当矿工、种橡胶。还有不少人发挥自己在家乡的优势，如侯北、东山、侯南不少人会打铁打铜，到南洋后就自己开打铁店，或在各地的罐头厂做罐头盒，待遇不错。

当做工或经营小商贩积累到一定资金后，即抓住机遇，投资工商业，不少人成为富甲一方的富翁。如茶阳戴欣然，“家赤贫，乃赴南洋。初为人掌簿记。”²⁵ 后积累到一定资金后，即开药店，后发展至巨富。张弼士初到南洋荷属巴达维亚城时到温氏米行当店员，后抓住住机遇投资垦殖、商贸、药材、矿产、金融、航运业等，至1870年代个人资产达白银8000万两，一跃成为当时南洋华人首富。

双坑何秋谷，初在星洲帮人打工，后做小生意，逐步发展为当店，名曰大源当。“后又开一间大山当和一间何长春药行（中药店）”，资产达百万，人称“百万公”。²⁶ 湖寮蓝秋山初到新加坡时，在商店帮人打杂。“因勤俭诚实，人皆见

²³ 《百侯楼下杨氏青箱世业房谱》，手稿，现藏大埔县百侯镇侯南楼下村杨海澄处。

²⁴ 杨懋然《我所知道爱护族人的族先贤》，《新加坡杨氏公会特刊》，页28。

²⁵ 温廷敬《大埔县志》卷3，页24-25。

²⁶ 《崧里何氏族史》（大埔县：崧里何氏族史修编工作委员会，1996）页930。

信，不一年争相聘请。后转习当业，经数年积蓄，接续创德和、万荣、生和、荣大诸当，竟有资材数十万，被举为茶阳会馆总理。族人在星洲商场，能有今日占一席之地者，皆公有着间接直接援引所致也。”²⁷ 经蓝秋山和他的儿子蓝森堂的辛勤经营，奠定了大埔人控制新加坡当铺业的基础。

据1920年统计，侨居新加坡的大埔人“大约总在万以上”，约占新加坡总人数的3%。“有正式商店三百四十五家，计京果店十五家，当店十七家，缝衣店十七家，珠宝旧衣店十八家，铁店三十八家，青果店七十三家，白铁店一百四十家，客棧二家，烟酒罐头店二家，书店二家，木匠店三家，金店三家，眼镜店三家，黄梨（即菠萝）厂三家，汇兑业四家，洋鞋店六家。此外尚有洋货店，及马路边摆摊。”²⁸

由于大埔人在南洋的艰苦创业和努力经营，基本上控制了新加坡等南洋地区的当铺业、中药业等。他们在当地投资开发土地，开采矿山，开办学校等，成为南洋地区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水客”：连接家乡与侨居地的桥梁

所谓“水客”，指专门到处采购货物及代人带信送款的商人。清末民初，银行业不发达，同海外几乎没有邮电往来，带钱带物回国需有亲友归国时才能实现。于是有些华侨自愿帮其他华侨带信带物回国，²⁹ 并为华侨带眷属和亲人出国，从中获取一定数额的报酬。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水客。

乾嘉以来，大埔往南洋谋生者越来越多。这些侨民多数为贫苦大众，文化水平不高，且居住分散，汇寄信款等极为不便，因此凡亲友回国，托带钱物者颇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演变，华侨当中出现专门在南洋收汇、回国解汇的水客。道光十七年（1837），高陂张杨泉开始从暹罗收汇回国。至民国时期，大埔县有水客296人，其中川走星马地区的有193人，印尼43人，暹罗22人，安南38人。³⁰

百侯一村，来往于家乡与南洋之间，专门以解送侨批为职业的水客，据调查在民国时期有杨俊明、杨善保、杨公琰等30余人，占了全县水客的1/10以上。其中著名的有杨水泉、杨潮荣、杨娘爱、肖东初、肖娘史等。除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占领了东南沿海和南洋外，水客走水一直较为畅通。

²⁷ 蓝海文《大埔蓝氏族谱》第7册，页644—645。

²⁸ 温廷敬《大埔县志》卷11，页22。

²⁹ 有的水客并非一开始主观愿意从事此业，而是因为其在南洋做工，但因赚不到钱而想归国，顺便代其同乡或熟知的华侨带钱物返乡，发现从事此业较他业有利可图而转而为之。

³⁰ 《大埔县金融志》（大埔县：金融志编写组，1989），页11。

百侯在南洋谋生者众多，因而来往于家乡与南洋之间的水客非常活跃，一年四季都有人奔走于其间。

水客走水，有大帮、小帮之分。水客内部有行规，大小帮分别严格，不能混走。大帮每年走南洋三次，即四月帮，又称端午节帮，二月出国，四月回国，带回钱物，帮助亲人度过三四月的荒月，同时又逢端午节，故名；八月帮，又称中秋节帮，六月出国，八月回家，所带钱物，赶上家人过中秋节，故名；年帮，九月出国，十二月回乡，所带钱物刚好为家乡亲人过年所需。这些都是赶在家乡人非常看重的三大节之前送到，对于家乡亲人意义重大，故称大帮。

而小帮则错开大帮归来时间外，不拘时间，一年四季都可以走。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七月帮、九月帮。七月帮刚好赶上七月十五中元节，虽侯南人大部分不过此节，但侯北肖姓村落则相当隆重，因此出门在外的侯北人都会由七月帮寄钱回家过节。每年九月，百侯各村要迎惭愧祖师、三山国王等各路神明祚福，祈福还愿，迎神赛会，相当隆重，在南洋的亲人都会托水客带钱回家祈愿。七月帮等各小帮因介于各大帮之间，因而又俗称“帮丫”。

南洋百侯人的侨批很少通过批局，而大多通过水客，除了担心信誉外，主要是因为水客经营是面对面服务，而且流动性大，收汇面广，服务较为周到，能满足客户各种个性化的服务要求。

首先是传递信息。在南洋，他们能深入山巴、矿山、大埠收汇，亲交口信，面达亲情，向各华侨介绍他们急于想了解的家属现状和要求及家乡变化。在家乡，又能到偏乡僻壤一家一户地送汇，告知侨眷其亲人在南洋的生活、工作情况。他乡闻乡音，见水客如见亲人，这些不是给批局的批信中不多的文字所能代替的，况且华侨尤其是女性侨眷很多都不识字。

其次是带人。家乡与南洋之间，路途遥远，风险很大，非有熟悉路线的人带路不可。新客、侨眷要出南洋，除跟随相熟的老客外，大部分都由水客带路。如由水客杨佛远从马来半岛新山带回的肖娘才给其母亲罗氏的批信（1936年4月10日）中说：“前寄佛远处叁十元，男嘱其将（儿子）美南带出以为川资之费，故存放在佛远身边。男现已叮嘱佛远不论如何下帮带美南来外，敢恳大人允男不情之请。”要杨佛远将他年近二十在家无所事事的儿子带到南洋来学艺。杨潮荣每年走水三趟，每次所带新客，少则几人，多则十多人，甚至几十人。到南洋后，他利用自己的人际网络和对当地社会的了解，结合各人的能力和特长，介绍相应的工作。因而由他带出去的人都很感激他，多托他把钱物和口信带回家乡，而家乡人也很放心。尤其是带妇女出洋，很多人在外无法回家完婚，或要妻子儿女出洋，多委托水客带送。

再次是带物，侨眷要给亲人的家乡土特产，如牛肉干、菜干、笋干、豆干、香菇等；华侨在南洋买给家人的物品，如高丽参、洋参、万金油、驱风油等，只有

通过水客才能安全快捷地送到。如肖娘才为其母祝寿的寿衣布料，就是由水客肖保甲带回来的。这些都是信批局无法做到的。

另外，不少华侨在相当偏远的地方做工，如马来亚雪南罗、万金等地的山里，远离城市，到批局汇款寄信相当不容易，而水客能够到这些偏僻的地方来上门收钱带信，提供服务。

由于水客们常年穿行于南洋与家乡之间，方便了两地的联系，密切了侨胞与家人的关系。如何半池（1862-1921），“为人致书邮，往返南洋，不惮劳瘁，利便乡人。”³¹ 何奕赛，1925年开始做水客，“为旅星侨胞带银、带物、送人、传口信，从无差错遗漏之事。且又热心细致，因而信誉卓著，倍受侨胞和乡人的赞赏。”³² 水客经营的虽是侨批，但其承载的却是家乡亲人与南洋华侨之间连绵不断的亲情。当然，也为南洋大埔人与原乡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纽带和桥梁。

三、南洋大埔人对原乡社会的影响

侨居在外的大埔人，虽然其事业在南洋，但他们仍然关注原乡，并与家乡保持着密切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对原乡社会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一）改善生活条件

1. 改善生活状况

百侯虽山多田少，人多地少，但在民国时期经济活跃，文化发达，生活水平居于大埔县的中上等，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有广大海外侨胞的资助。数十名活跃于家乡与南洋之间的水客，每年带回的侨批数千封，每封寄钱少则三五元，多则上百元，据估计每年资金多达十余万银元，成为百侯人生产、生活得以维系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甚至还出现了一批完全靠侨批生活的社会阶层，在侯南村，据估计人数近达1/5。百侯的牛肉干、忆子板、薄饼等食品，因华侨的特别推崇而成为当地有名的土特产，不少人以善于经营此道而谋得维生之资。

2. 建洋房，改善居住条件

俗话说：“发家致富，买田做屋”。在南洋各地发家致富的大埔人，多在家乡买田买地，盖洋房，在客家地区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³¹ 《崧里何氏族史》，页251。

³² 《崧里何氏族史》，页936。

如大埔湖寮的蓝秋山，在新加坡开当铺致富后，“还乡建筑慎德堂、种德堂、味道山庄。”³³ 湖寮蓝梦泉从新加坡还乡后，“建筑‘怀德堂’，广置田产，以遗后人。”³⁴ 双坑何添福（1871-1936），光绪年间在南洋经商，“囊橐稍充，即归里，建造房宇，购置田亩，利赖后嗣。”³⁵ 何海星、何光贝于民国十一年委托族人何奕赛，“回乡主持建造星拱长庚大屋”。民国二十二年，何采芹也委托族人何奕赛“回乡建造采芹小筑大屋。”³⁶ 在南洋经营工商致富的张弼士、戴欣然等，均在家乡买田买地，建造了豪华住宅。

这些豪宅有些是传统的客家民居建筑形式，如张弼士在家乡大埔西河黄塘盖的“光禄第”，是标准的围龙屋；何采芹在家乡盖的“采芹小筑”、蓝梦泉盖的怀德堂等，则是传统的府第式建筑。但不少是依照西洋的建筑风格设计建造，如双坑何曰生盖的曰庐，百侯杨潮荣盖的海源楼等，洋味十足。但不管哪种建筑形态，所使用的材料不再是传统的三合土，而是从南洋运回来的俗称红毛灰的水泥，以及钢筋等。而住宅内的摆设和布置，则仍然是按中国传统习俗来安排。因而这些建筑都是中西合璧式建筑，是南洋和原乡建筑风格互动的结果。

以百侯为例。民国年间，百侯村盖了不少洋楼，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村口的三栋洋楼。三栋洋楼依次企南楼、海源楼、肇庆堂，虽建筑模式不一样，但均为用“红毛灰”建成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并均建于民国六年。而最显眼的还是海源楼。该楼由村中大水客杨潮荣所建。其父在南洋开办橡胶园，去世后由坤荣、潮荣两兄弟继承。但两兄弟一个在南洋，一个在家乡，坤荣便把家乡的土地交给弟弟经营，而潮荣则把应得的橡胶园交给兄长经营，两兄弟也未分家。潮荣利用这种关系，以哥哥居住地为落脚点，以水客为职业，经常来往于南洋和家乡之间。后以经营水客业所得，于1917年10月建起了中西合璧式的豪华别墅“海源楼”。该楼建筑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共40余间房。最引人注目的是，除了用西洋色彩浮雕装饰外墙外，在正门三角形的屋顶正面，分别画着一条龙、一只凤，在龙、凤上面是两个裸体女郎手托至顶部的地球。该楼豪华、气派，西洋风味十足，成为该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同时也是他从事水客业信誉的象征和保证。

（二）举办地方公益事业

传统以来，地方公益多由宗族或庙会组织经营。但到民国年间，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地方自治运动兴起后，地方公益渐成社会公共事务。而地方自治

³³ 蓝海文《大埔蓝氏族谱》第7册，页644。

³⁴ 蓝海文《大埔蓝氏族谱》第7册，页646。

³⁵ 《崧里何氏族史》，页349。

³⁶ 《崧里何氏族史》，页936。

机构，又缺乏足够的资金去经营。随着村外社会阶层的出现，很多公益活动，便由关心桑梓的村外人去经营。

1. 架桥修路

大埔地处山区，沟壑纵横，修筑堤坝、架桥修路等，是乡村社会的重要公益。旅居于外的乡人，为了改变家乡的生产和交通条件，纷纷捐资进行架桥修路等。

侯北村位于梅潭河的北岸，光绪末年，因为河水冲刷，“冲没侯北田土数十亩，乡土日促。”引起侯北人的忧虑，但又无力维护。经商越南的肖益峰得知后，捐赠巨资修复，使得“溪堤一新”，“乡土得保”。³⁷

在汀江的支流上，戴春荣先后捐巨资建造了坪砂安溪桥、乐土新桥，并“资助各渡船等，以惠行旅。其他慈善之举无不为，有求者无不应也。”³⁸ 在修筑新宫子运新桥时，何秋谷“慨捐三行千金以成之”。³⁹

双坑村位于双坑溪两侧，因为经没发洪水，村道难行。经商南洋的何衍旺，热爱桑梓，对村中的公益事业建设，不遗余力，贡献良多。“对吾村道路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如捐巨资修筑协嘉堂至灰桥头、和也公祠至下济桥和有谷堂前的石砖路，老虎岷下到宫仔下睦和居的道路，睦和居至其竹头下的长石板路等。”⁴⁰

由于这些桥梁、道路的修建，大大方便了交通。

2. 救济乡人

清初大埔宗族建构以来，宗族设立尝产、义田等，对贫困族人的生老病死、婚丧等进行救济。尤其在发生灾荒时，以宗族公共产业救助族人尤力。如雍正三年，大埔发生旱灾，百侯杨氏族长杨之徐以尝祖进行赈灾。“丙午丁未（1726-27），连年米贵，用尝租煮赈以活族人，更募义助，煮赈以周通乡。迩来念族大丁繁，其间鳏寡孤独穷而无告，以及贫穷之死而无棺槨者甚多，因商族众，拔列祖余祭租谷以贍之。”⁴¹ 民国时期，水旱灾难不断，不时发生鼠疫，加上兵灾人祸，因而乡民死亡相继，生活困苦，宗族难以救助。旅居于外者，对于救济乡人起了很大作用。

³⁷ 肖惠南《大埔肖氏族谱》卷21，1935年手写稿本，页168。

³⁸ 温廷敬《大埔县志》卷21，页24。

³⁹ 《崧里何氏族史》，页654。

⁴⁰ 《崧里何氏族史》，页931。

⁴¹ 杨又时等《显考慎斋府君行述》，杨之徐《编年录》下册，《行述附》（上海：泰东书局，1924），页9。

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大埔发生严重的饥荒，在槟榔屿的戴春荣即“输粟数十万石为平糶，虽邻省贫民就糶不吝。遇他省灾荒，亦捐巨货助赈。”⁴²

1923年年底至1924年年初，广东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一次东征，许崇智部与陈炯明部在大埔高陂、百侯、湖寮等地多次交锋，且抓丁拉夫，强派军饷，使大埔各地遭受前所未有之“兵灾”，很多村民生活陷入困境。旅居南洋的百侯人得知家乡的困境后，于1924年5月5日，“为原邑兵灾开同乡大会，筹款赈济。”⁴³随后汇回款项，救济村民。

为使救济族人制度化，还捐款设立专门的救助基金。如上海富商杨富巨之母邱氏，于1922年六十大寿之日，“捐三千元存储生息，俾乡里贫而无告，为意外缓急之需，藉为纪念。”⁴⁴

后来村民以这笔款项为基础，成立了专门救助贫民的“贫民社”。并以邱氏为榜样，向旅居于外的村人进行募捐。1926年2月，为筹建族校经常往来于家乡与南洋之间的南洋劝捐员杨自修为此专门撰写了《百侯乡贫民社补助丧葬费捐册序》，全文如下：

人之生也，既有困穷富贵之区分，则有悲哀惨苦之事出，盖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困穷者家无储石，朝不谋夕，祸患之来，束手无策，其苦况诚有不堪言状者也。我百侯乡人多业少，其中经商致富积有余资者固多，即贫无而告、艰苦谋生者亦复不少。困穷之家，骤遭大故，其丧葬费除求人典鬻外，实无他法。然有求而弗得、鬻而无济者，甚有只身无物、流离死亡者，其惨状为何如耶！因此，有心世道者，莫不测然怜悯，思所以助之周济之。夫世界愈文明，则人道愈昭著，同类互助之责任遂因之而愈钜。氏虽女流，稍明大义，本个人之良心，积数十年之怀抱，提议创设贫民社，补助丧葬费，竭其绵薄，先认捐三千元，以为之倡。深望富绅巨贾、慈善士女，慷慨义囊，共襄善举，俾殒殁有资、埋葬有费，不致有死于道路、尸填沟壑，非特殁者感得其所，即生者亦戴德不忘矣。书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则斯社之设，当亦为仁人君子所乐与赞助者也。⁴⁵

由于有旅居于外的族人的救助，贫困村民的困苦境况有所改观。

⁴² 温廷敬《大埔县志》卷21，页24。

⁴³ 杨自修《编年录》第5册（手稿），页4，1928年。

⁴⁴ 杨富臣《家慈邱太夫人行略》，《杨母邱太夫人六秩寿言》第一册（上海：出版社不详，1922年铅印本），页3。

⁴⁵ 杨自修《编年录》第8册（手稿），页26，1928年。

(三) 抢救传统地方文献

晚清政府实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后，整个传统教育和文化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们不再读古诗，做八股文，不再念文言文，而推广白话，从而导致乡村教育和文化体制的根本性的转变。科举文化传统相当深厚的百侯人，面对传统文化积累如何处理问题，成为当时文化人非常敏感的事情。那些出门在外的读书人，为了让子孙牢记祖先在文治武功方面的贡献，自觉地发起了一场挽救传统文献的运动。其中杨氏编印了杨之徐《编年录》、《百侯杨氏文萃》，肖氏编印了《椒远堂诗钞》、《肖氏族谱》等，而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编印《编年录》。

1. 筹印《编年录》

杨之徐是百侯的名人，康熙二十七年的进士，其传说故事一直在当地兴盛不衰。他在六十岁时，开始整理其一生的经历及编写的主要文章，编成《编年录》，传诸后代。至民国初年，“各房裔孙，均有抄本。顾辗转传写，鲁鱼帝虎，在所不免。前数年希鸣叔以公手写《编年录》见示，叔姪诸人惧此编之遗失也，拟付割剞，以垂永久。”⁴⁶为保存祖先文献，族人决定进行编排印刷。但印刷的缘起、费用、编印等问题的商讨却不是百侯村里，而是借助邮政通讯，在上海与南洋的族人之间。

首先发起的是在新加坡的杨理卿。他于1923年函商于在上海百侯同乡会主笔的杨咏琴，提出印刷问题，得到海内外族人的赞同。同时议定，书为赠品，而非为谋利之卖品。但因经费未落实而不果。

印刷地点的选择。当时广州、汕头、上海等地有多家印刷厂，但百侯杨姓人在上海经商的多，尤其是乡中的文化人，不少集中在上海，而且中国的主要印刷书局也在上海，因此决定在上海印刷，由在上海的杨咏琴具体负责。而没有选择距家乡更近的汕头或广州。

1924年2月，在侨居新加坡的杨自修的推促下，杨咏琴经过调查和核算后，对于印刷费用，作了详细的预算：

拟印编年录，现已估计用报纸全大张，三十二开双面印，用五号铅字排印，每面四十六行，每行三十二字，印五百部，每页价洋一元三角二分，如印一千部，每页价洋一元五角二分。底页纸价另算。如印签条，亦另算。此估计印价之大略情形也。

⁴⁶ 杨咏琴《筹印编年录缘起》，杨之徐《编年录》附录，页27，1924年。

并提出了编印的个人意见。认为要纪念杨之徐，不妨将其像片也放进去。“兄意如果此书要印，不妨将光山公遗像请人拍照，只拍半身小照，做成铜板付印，钉入所印书内，籍作纪念。此项印费及做铜板，亦费有限，不妨与诸同人肩之。”

对于经费问题，他认为个人无能力，而要在南洋的杨自修等人想办法。“至此项经费，去岁理卿叔来函未曾言明，如何筹措，弟来信亦未及言及。是否由光山公派下子孙认筹此款，抑或另有的款，须详细告，以便进行。”⁴⁷

对于这件事，族人多有赞同。在安徽的子誉极表赞成，并当即表示捐款50元。“先大夫之编年录，得诸同志付之剞劂，极表赞同，愚名下先认派五十元。”同时还提出希望搜集编印杨氏文集。“再有请者，吾族文化最先，名士不少。请阁下以及诸位能于发起征集先达时豪各种集文，长编短牍，诗联图咏，搜罗成册，殊为有味。至于付印之项，或捐题，或作股亦可。未知诸位以为然否。此等之事，仍祈诸位文豪之士行之。然愚等不文，身居圈匱，又何敢浪谈。间有为吾言者甚夥。”⁴⁸

印制《编年录》，首先需要稿本。1924年3月杨自修趁回乡之机亲自在家抄录，同时另一发起人杨慕奚也将抄本寄到上海的杨咏琴。但在杨咏琴互校稿本过程中，发现很多差错。因此寄信要求将原本寄来。关于校稿的过程，他在6月11日给杨自修的回信中是这样说的：

编年录本应早行付印，缘弟抄本多错误，慕奚抄本亦有错字差，幸有真本寄来。兄不能不郑重其事，须费数礼拜校勘之光阴，方可付印。否则一经手即排出，再三校对，极形麻烦。故不如先行细细对过，免付印校对，多烦手续也。

同时还与自修讨论纸张、谣言和加入赞成人、缘起簿和杨之徐真迹问题：

纸张要好。琼石又言须用连史纸，此事有何难办到，不过看我印费多少，方能着手。如一味盲从，此亦兄之不愿为也。瑶阶叔谓‘薄于子孙，厚于外人’，实不免老嫗之见解。曾不思我辈子孙不忍听祖宗之手卷湮没起见，乃作为贾利之具，殊非我之初心。今既经议定，亦不必说。琼石函拟加入赞成人，原无不可，然编末如赞成人太多，不知好看否。南洋支叔侄认派如何，希能作速函知，并将缘起簿即行寄来，俾可编入编末，以清校勘之手续，随后付之手尼，使不致枝枝节节为之。此次印光山公真本篇首序语系光山公手笔，惜残缺不堪，不无负之。如果稍有面目可录者，将此真笔缩做铜板付印，兄实快之。

此刻杨自修在南洋新加坡启发学校任教务长，印刷费的定金已由杨惠庐等人在上海捐款支付，而余款的大头则要杨自修在南洋募集。

⁴⁷ 1914年二月初十杨咏琴给自修的信。原信存大埔县百侯村杨自修儿媳赖穆媚处，赖穆媚2008年3月因癌症去世。

⁴⁸ 1914年五月初一杨子誉给杨自修的信。原信存大埔县百侯村杨自修儿媳赖穆媚处。

《编年录》共印1000部，印刷费380元。但在决算时，杨自修等人在南洋所捐之款不够支付，由上海的富商杨绍臣垫付。寄往南洋的巨额邮费因无着落只好改由水客经汕头带往。“在沪及本乡与南洋叔梓认派，据惠庐叔言不过二百余元。印款不足之数，均由绍臣代垫。至寄越寄叻各一百部，子成叔言寄往南洋邮费甚巨，该费一时无人代垫。拟托信客带汕，由汕转托信客带叻越照交。为一时权宜之计，只可照行。”⁴⁹

书印好后编年录真本在年底交杨祖晏之子毓沪带回百侯，杨慕奚的抄本转交给了其父子誉，事情到此基本结束。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印刷本《编年录》。

由此可见，为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保存祖宗的遗迹事功，保护地方献，族人自发地参与了印刷杨之徐《编年录》。但在发起、募捐、校勘、善后等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旅居于外的族人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 倡修族谱

杨氏族谱，自乾隆二十六年以陕西按察使致仕归田的十四世杨缙绪编修后，因族大人繁，一直没有再修。至民国年间已200余年，引起了一些族中有识之士的忧虑。“然自十四世迄今，代增八九世，年将二百，族益大，而人事益繁，言修族谱，诚非易事。弟及今不修，恐年代久远，椒蕃瓜瓞，非特至亲视如路人，即乃高曾祖父之名讳谥号、履历、坟墓，亦将茫然罔觉。言念及此，不禁三叹。”⁵⁰

杨自修自南洋新加坡归来，担任南洋华侨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取得崇高社会地位的杨自修归乡后，慨然以修族谱为己任。“乙丑秋，余忝充南洋新加坡代表，赴京参与选政。冬竣返省，竟丁父忧。读礼数月，时若稭提议修谱，召集父老兄弟会议于十五世祖祠者。再定分房调查，公举稭总其成，余则襄助料理。”⁵¹ 因200多年没有修谱，很多族人的资料已经遗失。为此，他们认为，要修好族谱，首先由各房进行调查，编好房谱，再在此基础上总编成全族的总谱。在杨自修主持下，编修了杨自修所在房的房谱——《百侯渊雅公房谱》，并于民国15年付印。“其中大要，自十五世上溯开其祖，一脉直书，不及旁支者，盖有族谱在也。然族谱所载，十五、十六、十七三代，略而不详，以下并未记载，是以房谱之修，自十五世以下，依族谱旧例世系，分房填记，蒸尝祀业，亦概附入。斯谱也，虽为支中之支，小而又小，然后之续修谱者，得此编而附入，似不无小补云。”⁵²

⁴⁹ 杨咏琴1925年元月六日给南洋杨自修的信。原信存大埔县百侯村杨自修儿媳赖穆媚处。

⁵⁰ 杨自修《渊雅公房谱序》，《百侯渊雅公房谱》（汕头：大生行印刷部，1926年铅印本），卷首。

⁵¹ 杨自修《渊雅公房谱序》，《百侯渊雅公房谱》，卷首。

⁵² 杨自修《渊雅公房谱序》，《百侯渊雅公房谱》，卷首。

侯北肖氏自乾隆十六年编修族谱后，虽时有续修之议，但一直没有成功。一直到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出外经商的肖惠南回乡后，在族中老成的责令下，于侯北街头设修谱办事处，动员国内外全体族人参与：

我族修谱之议，前清末叶，族先达迭有提倡。入民国后，族众一再言之，迨民国廿年间，旅外贤达菊魂、干臣诸人，倡议尤力。编纂与经费均有办法。百侯原乡典臣、谨卿、季伟诸叔侄，且经开会认款，着手调查。诂人事变迁，忽又中辍，族众为之嗒然。去年冬，惠南自汕回乡，族叔复跟跟以修谱为词，且谓事关全族大典，不宜再延，责惠南勉肩其事，语极诚挚。明知棉薄，义不敢辞。于是追随族贤达，拟具章程，筹措经费，推举负责人员。于本年一月一日，在百侯溪北新市场设办事处，着手筹办。旋复加推旅外族贤达有声望者，为董事长及董事，领导一切。现在章程业已修正，并经开收经费，着手编纂，分函各处族众，共同赞助。⁵³

整个修谱工作虽由回乡的肖惠南主理，但领导修谱的董事长及董事，却是旅居于外的族人担任，并提供大部分经费。由于主持得力，经费充裕，族谱于当年修成。

(四) 维护家乡社会稳定

清末民初，地方社会动荡。侨居海外的大埔人，为了维护家乡社会稳定，纷纷出资组织保安机构。如新加坡富商蓝秋山，捐巨资设立联合公所。“清末盗贼蜂起，人心惶惶。公发起十八乡联防互保公所，出资倍于十八乡所捐之总数。立案请准，设联保公局。聚集团练，附近各乡赖以安靖者三十年。”⁵⁴成为稳定地方社会的重要力量。

在政权鼎革之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甚至直接插手地方政务。在辛亥革命胜利大埔县光复之际，“知县逃亡，各派纷争政权”，土匪趁机打劫，地方社会动乱。新加坡富商蓝秋山之子蓝雪桥出面调停。在他的建议下，大埔县设立保安局，作为临时县政府。“以张弼士子秩卿为局长，使之出金办理全邑善后。埔邑赖安。”⁵⁵在南洋富商张弼士之子张秩卿的大力资助和领导下，动乱被平息，大埔平安渡过这一动荡时期。

1920年代是中国民主革命高涨时期，地处赣、闽、粤边界之地的的大埔，常有军队进出，所过之处，抓丁拉夫，造成社会动荡，引起侨居于外者的忧虑。百侯村在侨居于南洋的杨自修等人的组织和推动下，1924年3月专门设立了办事处，“现

⁵³ 肖惠南《肖氏椒远堂修谱说略》，《肖氏族谱》，1935年稿本，卷首。

⁵⁴ 蓝海文《大埔蓝氏族谱》第7册，页644。

⁵⁵ 蓝海文《大埔蓝氏族谱》第7册，页655。

值军兴时期，常有军队经过，供给夫役，事务繁多，特设立办事处，”以便应付。同时经过各方讨论，还制订了办事简章，⁵⁶ 为维护地方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

清末民初，地方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传统社会习俗亦发生变化，尤其是传统道德沦丧，引起侨居海外的乡人的忧虑，并自觉地承担了维护传统习俗的角色。

如湖寮双坑村，原来“古道尚存，裹小败类。”何凌云在新加坡经商致富后，发现家乡“晚近人心不古，渐有作奸犯科之事。”为防止其蔓延，“捐资五百金生息以为岁费，函请淑斋公暨合族绅耆呈县存案，请示八款，勒石遵守。”⁵⁷ 所谓八款，即“一禁内外盗贼；二禁窝纵分肥；三禁形象场聚赌；四禁服毒图赖；五禁借端勒索；六禁谋占坟产；七禁私放重利；八禁背写祖业。”⁵⁸ 由于有侨居新加坡的何凌云所捐资金的支持，这些条款得到很好的执行，风俗为之一变，“乡里嘉赖焉。”⁵⁹

出门在外的华侨，对于家乡亲人的感情认同相当深刻，往往对养育其成长的老人非常关心和尊敬，从而成为尊老爱幼传统道德的维护者。只要寄钱回家，都会特别叮嘱要关心老人，分些给老人为“割肉之需”。如1932年11月初三，侯南杨姓人的女婿蓝爱程从新加坡和美酒庄寄给外甥杨金河的批信中说：“兹值鸿宾水客之便，顺寄光洋五元，收后照交曾祖母肉资一元，余四元则交祖母收用可也。”“现下水客返唐，顺寄大洋三十二元，内交伯姆肉银三角。”⁶⁰

有时以是否关心老人作为与否批款的标准：“兹帮甲哥回唐，顺寄中央银六元。如兄嫂（即肖广才夫妇）有奉侍母亲，可交一元与他。如无奉侍，不必交他。仍余，望大人为肉之需，不可过省，要食买来食。”⁶¹

并一再告诫子侄要尊重老人，顺从老人的意志，否则就是不孝。如1932年9月12日由水客杨传教从新加坡带回给杨金河的批信中说：“曾祖母、祖母年迈在堂，你祈善于侍奉。家中事无大小，务要细语商量，未可稍违老人意。须知孝顺即为儿孙者应尽之天职，在理在义，均不容辞。在星（即新加坡）临别时，谆谆诫语，你能记忆否？苟无遗忘，使远在南洋人亦可略为宽心也。”

在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海外华侨的关注，对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他们也是一些陋习的传承者。

⁵⁶ 杨自修《原乡特设办事处维持公安》，杨子源抄本，现存大埔县百侯镇侯南村杨兆和处，1950年。

⁵⁷ 《崧里何氏族史》，页920。

⁵⁸ 《崧里何氏族史》，页1192。

⁵⁹ 《崧里何氏族史》，页920。

⁶⁰ 1933年11月18日肖娘允从新加坡给母郭氏的批信。

⁶¹ 1936年10月20日马来半岛新山肖娘才给母罗氏的批信。

侨居南洋的大埔人，对于西方的科学知识应该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并对家乡的一些费钱费物的传统习俗应该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但他们却是这些习俗的维护者和资金资助者。

在客家地区，多子多福的观念很深，华侨也是这一习俗的维护者。如肖娘才，他已有两个儿子，但其年近九十的老母罗氏认为还是少了，因此花钱为肖娘才买了一个儿子。过年时要为新买的儿子起名，上祠，上灯，肖娘才通过“年帮”，对这一事情作了详细的交待：“本年买一孙儿，要择名上祠，以我想二名：宝南、观南，此名未知祠上有同否。若有同，在家另择可也。兹寄来大洋二十元，以应度年。内贴庄丁（上灯）一元。吹笙与从仙哥商酌，可以贴补否，以省手续。若可以，帮贴二元。如贴不得，另嘱托渐妈代办就是，大约四五元开销。仍余之款，为母亲名下收用。”⁶²

客家山区的神明崇拜、游神赛会虽不如潮汕沿海地区狂热，但也有相当影响和规模。而其资金的来源，不少就是海外的华侨所捐助。如肖娘允在1932年6月初五日寄给其母郭氏的批信中交待：“寄来大洋五元……又者七月二十一日下坑师爷圣旦，题猪羊会银一元。”

在一个月后的7月19日的批信中交待：“现寄回大洋二十元……五显帝公题有猪羊银一元。”

在第二年的7月14日，肖娘允母亲郭氏在给他的信中告诉他：“乡中集福系八月初二，不卜男到时可能回家否？如果仍有工夫可做，小银务多寄一些回来矣。”

(五) 举办新式学校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受西方列强侵略，而且屡战屡败，国势日弱，对侨居海外的华人影响很大。“外人日藐我国为野蛮，于是侨民乃大戚。”⁶³ 侨居海外的华人，亦倍受屈辱和欺凌。为改变现状，侨胞们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法。其中举办新式教育、培养人才，成为海外华侨的首选。如双坑人何惠荃1902年奉派至加拿大任外交官时，“经游各国，纵观名胜，考察东西各国学校，与夫制造、美术等厂，益知中国兴学校、实业之不容或缓。甲辰（1904）遂在槟榔屿创立中华学校，立章程，筹巨款。”⁶⁴ 湖寮人蓝森堂认为，“知欲国强，必须改革教育。乃与同吧侨商笃办启发学校。”⁶⁵ 戴春荣不仅在南洋设立侨校，而且捐巨资在家乡设立大埔小学、崇和学堂等新校十余所。“辛丑（1901）朝旨合各省遍设学堂，春荣遂捐巨

⁶² 1935年12月10日肖娘才给其母罗氏的批信。

⁶³ 温廷敬《大埔县志》卷21，页24。

⁶⁴ 《崧里何氏族史》，页928。

⁶⁵ 蓝海文《大埔蓝氏族谱》第7册，页654-655。

资，助立潮州、大埔及新加坡、槟榔屿十余校，凡十五万金。”⁶⁶ 蓝森堂也在家乡资助创办湖寮、三河、高陂、大麻等地创办新式学堂。正是因为海外侨胞的大力支持，清末民初，地处山区的大埔掀起了办学的潮流。

而他们的办学实践，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在原来传统教育基础上创办新学，因而办学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经曲折，与原乡有着密切的互动过程。以百侯为例。

在科举时代，自明末清初以来，百侯科举兴盛，为大埔乃至粤东地区最发达之地。在清末民国废科举、兴学堂过程中，百侯地方经历了怎么样的变迁过程？

1. 早期依靠族产办学之曲折

清末学政改革，废科举，兴学堂，传统私塾教育改为学堂教育。其条件一是师资，二是办学场所，三是教育经费。

为解决师资，推行新式教育，各地政府和有识之士纷纷兴起师范学堂，粤东地区比较有名有丘逢甲创办的岭东同文学堂、黄遵宪创办的东山师范学堂，韩山书院改为惠潮嘉韩山师范学堂等。大埔县政府于1906年年初在潮州创办了茶阳师范学堂，招收生员等各界文化人为学生。至1906年年底第一届82名毕业生中，百侯籍的22人，占全县毕业生总数的26.8%。人数位列全县第一，体现了百侯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但在办新学过程中，却历经曲折。

1905年12月3日，惠潮嘉韩山师范学堂举行第一次毕业典礼，百侯的杨咏琴列为优等，成为百侯杨氏第一个接受近代师范教育的毕业生。满怀改变旧学壮志的杨咏琴于12月中旬回到家乡后，即提倡筹办族学，“传集老成，会议于延庆堂。经众决议，划定四、五、八三代祖尝各拨一百元，复由各房私尝酌派四百元，为常年经费。先移出二百元为开办费，定办高等小学，附设初等，名曰‘杨氏家族两等小学堂’”，创办了百侯第一所新式学校。学生半百，暂借松台书室为校舍。教师由茶阳师范毕业生担任。

虽然开办新式学校名义上得到宗族支持，但作为新生事物，开办之初即遇到很大阻力。“风气未开，办理棘手，胥笑怒骂，比比皆是。”尤其是祖尝为族长把持，拒绝拨款，导致办学相当困难。第二年因经费无着，被迫停办，其原因是：“乃顽劣绅士杨升朝、杨锡文等，把持尝款，多方阻挠。”⁶⁷ 1908年年初，在师范毕业生杨琼石、杨自修等与族绅们多次争吵后，族学高小得以借杨氏大宗复办。

⁶⁶ 温廷敬《大埔县志》卷21，页25。

⁶⁷ 《岭东日报》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潮嘉新闻〉。

对于复办及与守旧族绅们争斗的过程，参与者杨自修在自己所编《编年录》中有详细记载：

正月二八日，与琼石叔等决议复办高小，公推琼谷叔为董事，任筹款；琼石叔、子光叔任教员。三十，上书劝学所总董张龙云（号六士），转详管学官李示谕。二月初六日，与琼石叔赴县谒劝学所，声明族学复办理由。初八日，县专差送到公文、铃记，照会校长杨国璋。谕尝董杨升朝（椒生）缴交案款，谕族长杨锡文（镜河）、杨晋堃（益堂）竭力襄助。初十日，族老成齐集延庆堂，议办族学。公推余于大宗祠任筹办员。次日余先搬住大宗祠，琼石叔继之。随着人陆续搬校具，并布置一切。时议论纷纷，笑骂之声不绝于耳，甚且欲以强蛮手段加余者，余亦不为动。十三日，揭示开学期。老成辈大以为不然。十五日，行开学礼。下午即上课。族老成集百余人，于三点钟筹议于大宗祠，为抵制也。未几，琼石叔到，邀修出与理论，彼辈理屈词穷，初私避花胎，后潜逃星散。遂依次封尝款。次日，余等即将开学情形上书劝学所，转详管学官。十八日，族老成着人赴县，禀报余等借学营私，被县批斥。子光始入堂任事，堂中学生三十余人，分为高等预科（一年毕业），初等本科（二年级）两班，按照钦章办理，自编乡土地理、格致课本。瑞廷兄月杪特自县回调和办学风潮，新旧皆否议。三月初三日，老成辈又着人赴县进禀，被管学官李批斥详革等语。嗣是琼谷屡次向收尝款，分文不得。二三日，再将办学理由上书劝学所，转详管学官。……十二月，奉提学宪批，限十日内清理族学，俾继续办理。胡管学即照会校长譬臣伯（既自京旋）三天办复。于是中立者乃竭力调停，由祖尝内拨出一百二十元，劝琼石、子光作减薪收而了事，族学嗣后由老成办理云云。⁶⁸

由于经费来源取决于掌管族产的族绅，新式教育举办相当不顺利。这解决这一问题，有志之士不得不寻找新的资金来源。而侯北肖氏因得侨资资助而使族学的成功举办，也为杨氏族学的兴办提供了榜样。

侯北肖氏族学在举办之初，也遇到了经费困难问题。但因得在越南经商的富商肖益峰的资助，学校顺利开办：“大埔百侯乡肖绅益峰，具有热心，凡一切关于学界中事，无不慨然乐助。本年春百侯肖君某倡设家族两等小学，苦无经费。该绅欣然捐助二百金，为开办费，家族学堂，赖以成立。”⁶⁹ 因此后来他们在创办新校时，很注意争取侨居于外者的资助。

⁶⁸ 杨自修《编年录》第1册（手写稿本），页21-26。

⁶⁹ 《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四日（潮嘉新闻）。

2. 筹建杨氏高等小学新校

1924年4月1日北京《侨务旬刊》第109期以《华侨关心桑梓教育》为题，登载了广东大埔影园所撰写的一则消息，全文如下：

广东大埔百侯杨氏高小筹建新校，前派杨自修君为南洋劝捐专员。该族侨南人士继请自修君返梓选择校址，磋商进行，详见本刊九六期通信。旋因侯乡叠遭兵燹，自修君乃应南洋砂劳越侨校之聘，复出而长大同学校者一载。后侨南同人得悉潮梅等处枚平，桑梓教育之念关切，再请自修君于本年一月迺归，以南洋代表名义，重振旗鼓，召集族众，组织建校董事会。其分子由南洋、上海、本地各举三人（南洋琼石、潮荣、洲之，上海仰韶、竹史、辉生，本地馨甫、星九、若凡），爰于二月七日开成会，即组织干事部，公推自修先起草章。次日公同讨论修订，遂按董事会章选举干事员，开票结果，自修、仰韶为正副总理，星使、庆禧为正副财政，（汕头）集成发（绸缎庄）为外财政。该族南北洋与故乡人士，咸庆得人，新校落成可拭目而俟矣。（自修君素有名于南洋教界，未审能就任该总理否？）

侨居南洋的杨自修，何以深得国内外乡人信任和赞同，被推举为建校董事会总理，全权领导家乡建桥事宜？

杨自修为百侯侯南通议第人，1882年出生于书香之家。1905年于茶阳师范毕业后，立志兴学育才。1906年与茶阳师范的同学一起在家乡任初级小学教员。第二年又在任大宗理事、代理校长。1907-1909年先后任枫朗任日新学校教员、校长、湖寮莒村培英两等小学代校长。辛亥革命后，1912年任县立高小教员。1914年出国至新加坡，受聘为启发学校教员。1918年至1919年任槟城大山脚（地名）日新小学校长，1920年至1921年先后任槟城崇德学校校长、日新小学校长。

自创办新式学校以来，各校均以祠堂为校址，没有属于学校的专门办学场所。随着入学人数的增多，办学场所越来越紧张。1922年正月十八日，为解决学童就学困难问题，百侯各界有识之士召开会议，决定筹建杨氏高等小学新校。为解决巨额的建校经费问题，动员海内外乡亲支持办学，家乡父老组建了一个包括南洋、北洋、家乡在内的跨国性的建校董事会，并一致推选教育界德高望重的杨自修出任董事会正总理。身居海外的杨自修先生以桑梓教育事业为重，当年十月代表旅居南洋各界华侨回国磋商建桥事务。

1923年他出任沙撈越大同学校校长，积极出面募捐建校款。校董会择定新校址，决定在榕荫书室背福坛丘得邻近的地方建校（即现在的百侯中学校址），购买建校用地205.51平方丈。旅居南洋各地华侨捐款千余银元，旅居上海的乡贤杨虎臣先生捐300银元。建校喜讯传出，国内外报刊纷纷刊登建校消息，海内外百侯乡人为之振奋。

由于建校工作的需要，杨自修先生毅然辞去优厚待遇的校长职务，专心履行建校董事会正总理的职责。亲自出马奔赴南洋募捐建校款，由上海而南洋各埠拜谒乡贤、华侨。在他的推动下，旅居南洋各地华侨欣然响应，已认捐白银壹万余元。以后数年间，他不辞劳苦辗转于南北洋，为建校而竭尽全力。虽然历经曲折，但终有所获。正如他在1925年12月所撰《南洋劝捐专员报告书》所言：

吾族高小，成于丙午（1906）。廿年来，成绩若何，姑且勿论。辛酉壬戌（1921-22）学生增多，大宗已不能容，执事诸公乃发起建校，中外各报，特载叠登，风声所播，至处皆知。自修叠承委托，荏苒数年，谨将经过事实与捐款，胪列报告，幸垂鉴察。

壬戌民十一，是年自修续长南洋檳榔屿大山脚日新学校。时维孟夏，奉到大札与捐册，委修与瑞廷、子光二君为族属劝捐员，即会同磋商，金时艰人少，各为贵职环境所限，囑修具函告辞，乃族众反以南洋劝捐专员季修。时值暑假，奉读尊札，感愧莫名，窃念致身教育者，侨南无几，不能不趁此时赴叻试办，遂寄寓于刘登鼎君商店，日游说于竹林之门，晚筹策于知交之间，函报交驰，极力运动，始克召集会议，再三演讲，得有头绪，乃与旅叻劝捐员出而沿门劝募，认定两千余元。又赴麻六甲募得两千元，再进淡边田芙蓉而吉隆而巴生而牙岳，复过霹雳入檳榔屿、湾噶吸，经吉隆而返叻，再往各处，历时三月有余，约捐六千余元。时侨南竹林惟恐空中楼阁，终成泡影，于认捐之际，要求任代表返梓组织筹备处，选举校董，择购校址及建筑一切事宜。修不得已就任，及冬抵家，日与淑之君等，相度地址，计十余所，无奈合式者购难，易购者不合。稽延月余，军队复临。修适奉南洋砂劳越侨校之聘，又别父老兄弟而南行，趁此由叻而甲而屿而雪兰莪等处，报告原乡状况，以清代表手续，然后归越就职。计由暑假至此，费时半年，未见实效，深为抱歉。

甲子民十三，癸亥冬，修奉先严命，辞侨校而返。甲子新正，高小建校董事会告成，续组干事部。修又蒙诸君过爱，被选为正总理，一再告辞，未蒙俯准，不获已暂任而俟。即分函南北洋，催收捐款汇回。二月，与诸同事请吴区长诣福坛坵，复丈量校址，布告办法，招业主到筹备处定价买卖。三月间，叠开会筹商，进行表决，委修赴南北洋催收捐款。遂于念八日束装赴滬。四月中旬抵上海，即会同子成伯等，按册收款，或交现金，或立限单，依壬戌认数目，清理收束。五月，由滬返梓。六月，复束装南渡，由叻而甲而雪兰莪霹雳檳城等处，回叻入越。至九月杪，复返新加坡。统计南洋捐款，共收两千余元，得总数三之一。⁷⁰

⁷⁰ 杨自修《编年录》第8册（手稿），页4-9。

该报告书详细地记录了杨自修自担任建校董事会总理后，奔赴于南洋、家乡、北洋之间，拜谒乡人，解决捐款者所提的各种问题，落实新校选址等问题。

1924年11月21日，建校董事会根据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作出将计划建高等小学改为建中学附设高小的决策。杨自修所募集的海内外捐款，就移作创办百侯中学使用了。

至1942年，百侯中学董事长杨德昭以办学已初见成效，海外侨胞要求增办高中为由，向地方当局申请增办高中部：“过去所办，仅为初级中学，而所收容学生，十九为贫寒侨胞子弟。（因大埔粮食短缺，居民多出洋谋生，尤以属校所在地环近为最）彼辈于初中毕业之后，欲寻觅职业，则限于学历技能。欲继续升学，则困于家庭经济。缘大埔全县，现仅大埔县立一中有高中之设立，此外则须远求于梅县或饶平。……基于上述原由，故年来地方人士及海外侨胞，纷纷以增办商中部俾能容纳本校及环近初中毕业学生为请。并承海外热心侨胞于去年自动募集十二万三千二百元交由水客带回，作为建筑和设备费用。”⁷¹ 并动用私人关系，直接将申请报告送到广东省政府教育厅，结果得到批准。百侯中学由此成为大埔县第一所私立完全中学。

1943年9月25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亲自撰写了《百侯中学复校十周年纪念》、《百侯中学校歌》，以志庆贺百侯中学办学之成功。⁷² 其歌词曰：

源头活水，逝如梅河。廓岭凌云，无或磋跎。生辰美吉，树人已多。千灾万难，如琢如磨。金刚坚利，克服凶倭。与国同寿，与民同歌。

手脑双敲，未知之门。岁寒松柏，求仁得仁。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努力创造，始败终成。文化为公，百侯精神。

百侯乡村的近代新式教育，从小学而初中、高中，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但在侨居于外的乡人的资助和主导下，从精英教育走向了普及教育，从一个小山村走向了全国、世界，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化之乡”。这是大埔近代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四、结语

大埔传统以来是一个内陆山区，人多地少，山多田少，居民难以维持生计。但自近代以来随着“国门”的被打开，大量村民离开家乡，侨居南洋等。他们不仅推动了南洋等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对祖居地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⁷¹ 杨德昭《为增办高中呈教育厅稿报告》，大埔县档案馆《民国档案》。

⁷²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4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页592。

人多地少，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是移民的基本因素，而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则成为出外创业者的主动性选择。民国时期的百侯人，“少数业农，多出上海、南洋各地谋生”，产业结构发展根本性变化，以外出谋生为主的外向性经济成为当地社会的主要特色。侨居于外者不仅通过水客接济家人生活来源，而且在家乡盖洋房，架桥修路，救济乡人，支持举办新式教育，从而使家乡成为粤东地区典型的“侨乡”。

村人倚南洋为“外府”，不仅侨资成为村民的主要生活来源，而且侨居于外者成为建构家乡的决定性力量。家乡的政治、经济、教育、族务等事务决定权，往往被侨居在外者所控制。伴随着侨居者与家乡之间密切的互动过程，传统乡村事务处理的运作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村落话语权的转移，乡村事务的处理也随之跨越了村界、国界，而具有国际性，从而形成近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一种观点认为，近代中国乡村社会之所以很快变质，是因为近代中国教育制度变革后，导致整个社会制度的变化，传统乡村社会的精英纷纷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导致乡村社会被劣绅控制。⁷³ 从以百侯为个案的大埔地区来看，传统士绅即使离开家乡到了城市，乃至国外，他们对家乡的关爱，对家乡事务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并没有放弃，继续发挥着传统士绅的影响和作用。

参考文献

- 《百侯楼下杨氏青箱世业房谱》，手稿，现藏大埔县百侯镇侯南楼下村杨海澄处。
- 《大埔县金融志》（大埔县：金融志编写组，1989）。
- 《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四日《潮嘉新闻》、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潮嘉新闻》。
- 《梅州市华侨志》（广东：《梅州市华侨志》编委会、广东省梅州市华侨历史学会，2001）。
- 《崧里何氏族史》（大埔县：崧里何氏族史修编工作委员会，1996）。
- 《新加坡茶阳会馆百四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茶阳会馆，1998）。
- 费孝通《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邝国祥《槟城散记》（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58）。
- 蓝海文《大埔蓝氏族谱》第7册（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
-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4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 温廷敬《大埔县志》第3、11、13、21卷（大埔县：大埔县政府1943）。

⁷³ 费孝通《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页53-56。

无名氏〈论大埔邮政宜推至白侯〉，《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肖惠南〈肖氏椒远堂修谱说略〉，《大埔肖氏族谱》，1935年稿本。

肖文评〈从“贼巢”到“邹鲁乡”：明末清初粤东大埔县白垵乡村社会变迁〉，《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杨德昭〈为增办高中呈教育厅稿〉，《民国档案》（大埔：大埔县档案，1942年）。

杨富臣《杨母邱太夫人六秩寿言》第一册（上海：出版社不详，馆1922年铅印本）。

杨光辅〈归善德化桥杨氏归宗序〉，《归善德化桥杨氏族谱》，道光二十三年三月。

杨慰然〈我所知道爱护族人的族先贤〉，《新加坡杨氏公会特刊》（新加坡：杨氏公会，1968），页28-29。

杨之徐《编年录》上册、下册、附录。（上海：泰东书局，1924）。

杨自修《百侯渊雅公房谱序》（汕头：大生行印刷部，1926年铅印本）。

杨自修《编年录》第1册、第5册、第7册（手稿），1928年。

杨自修等《原乡特设办事处维持公安》，杨子源抄本，现存大埔县百侯镇侯南村杨兆和处，1950年。

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

信件

杨咏琴1925年元月六日给南洋杨自修的信。原信存大埔县百侯村杨自修儿媳赖穆媚处。

杨咏琴1914年二月初十给南洋杨自修的信。原信存大埔县百侯村杨自修儿媳赖穆媚处。

肖娘允1933年11月18日从新加坡给母郭氏的批信。

肖娘才1935年12月10日给其母罗氏的批信。

肖娘才（马来半岛新山）1936年10月20日给母罗氏的批信。